

# 弃核的可能性： 理论探讨与案例比较

张 春

**【内容提要】** 一国弃核是多重因素的结果,包括国内政治、安全、规范和强制外交。尽管安全是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动机,但安全环境的改善至多只是弃核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一国弃核与否最根本地取决于其国内政治。规范与强制外交只是一种催化剂,它可能会加快或延缓一国弃核的步伐。作者选择了南非-以色列、巴西-阿根廷与印度-巴基斯坦、利比亚-朝鲜这三对案例进行比较并验证上述理论假设。作者认为,针对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核扩散困境,合理的方法应当是促使弃核政策深入到一国的国内利益集团,从而营造一国弃核的国内政治条件。

**【关键词】** 弃核;可能性;理论分析;案例比较

**【作者简介】** 张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亚太室副主任,博士,助理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040)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7)12-0048-8

进入2007年以来,朝鲜核危机总体上呈现缓和趋势,不少人甚至表现出乐观情绪,就连美国总统布什也对在其任期内结束朝鲜核危机表现出信心。<sup>1</sup>当然,由于外界对朝鲜的国内政治决策过程了解有限,因而对此仍存在诸多怀疑。这样,学者们在分析朝鲜是否会真正弃核时,往往会依靠一种理论上的推理,再辅之以其他案例的经验性验证,从而判断朝鲜的可能发展方向。本文也遵循这一模式,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弃核的可能条件,然后将其应用于冷战结束后的几对国家在是否弃核问题上的决策加以比较,以期得出朝鲜弃核可能性的大致判断。笔者认为,安全环境的改善并非弃核的充分条件,一国弃核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国内政治的要求。根据这一理论假设,本文对冷战结束后弃核与继续发展核武器的三对案例加以比较研究,即南非与以色列、巴西-阿根廷与印度-巴基斯坦、利比亚与朝鲜,试图以此为朝鲜的弃核可能、国际社会的防核扩散努力提供一定的思路。

## 一 弃核的可能性分析

笔者试图从理论和案例研究得出有关弃核可能性的启示,以解释有些国家为什么会在核计划已经取得发展、甚至制造出核武器之后会弃核。本文将“弃核(nuclear rollback)”定义为:一国政府以官方形式彻底、可验证和不可逆的方式完全终止其核武器计划的行为。<sup>④</sup>具体而言,有两个衡量的标准:一是该国曾积极发展核武器,曾排除一切争议,只考虑获得核武器;二是后来又以彻底、可验证和不可逆的方式完全终止

<sup>1</sup>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oundtable Interview of the President by Foreign Print Media,” August 31, 2007,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7/08/20070831.html>

<sup>④</sup> 需要指出的是,“弃核”不同于有的学者所称的“撤销核计划(nuclear reversal)”,后者是指“放缓或停止一项官方的核武器计划的政府决定”,因此显然比本文所讨论的弃核要宽泛。关于撤销核计划的讨论,参见 Ariel Levite, “Never Say Never Again: Nuclear Reversal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3 2002/2003, pp. 59-88.

了核计划。

有两位学者曾根据一国对发展核武器的兴趣及实施过程进行了阶段划分,“0”表示一国对获取核武器没有兴趣,“1”表示它开始允许讨论该项选择,“2”则表现出积极发展核武器的明确政治决策,“3”是一国开始了第一次核爆炸或获得了第一枚核武器。<sup>1</sup> 根据这样的划分,一国弃核应当至少发展到了“2”阶段,然后重新回到“0”阶段。<sup>④</sup> 这样,到目前为止,符合这一标准的弃核国家就有八个:韩国(1979年)、阿根廷(1991年)、巴西(1991年)、白俄罗斯(1992年)、南非(1994年)、哈萨克斯坦(1995年)、乌克兰(1996年)和利比亚(2003年)。

尽管弃核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但目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相当缺乏,主要研究都集中于单个国家的案例研究。由于这些案例研究较为分散,涉及大量的变量,并未形成一种总体性的解释框架。目前的学术研究往往做这样的假设:如果理解了一国制定核发展政策、启动核计划的原因,就能找到促使其弃核的解决方法。目前,有关弃核的研究大多与对导致核扩散原因的研究联系在一起。因此,本节将首先对前人的相关研究做一简要回顾,考察其大致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以便为下文的案例比较研究奠定基础。

就目前的既有研究而言,斯科特·萨甘(Scott Sagan)所做的研究或许最为全面。他将核扩散与弃核结合在一起研究,提出了三个模式:国家安全模式、国内政治模式和规范模式。安全模式假定,一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国家安全,因为它意识到国家面临着安全威胁——真实的和想象的。因此,一旦该国认为国家安全威胁大大下降甚至消失,弃核便成为可能。萨甘认为,运用安全模式解释南非弃核再合理不过了。相比之下,国内政治模式突出了华尔兹层次分析法中的第三层次,即国内的特殊个人和团体(主要包括核武器的研究人员、军队和政客),这些人和团体出于种种原因支持发展核武器。据此,一国弃核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即这些特殊个人和团体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减弱或权势地位下降。萨甘使用国内政治模式对巴西、阿根廷的弃核进行了分析。规范模式也可称做是声望模式,萨甘认为核武器可作为一国国际声望的重要象征,一国追求核武器极可能是出于对国际声望的渴望。因此,反对核扩散的国际规范的出现及

其带来的政治、经济压力,对于一国弃核可能是重要的,乌克兰的弃核案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sup>④</sup>

米歇尔·莱斯(Mitchell Reiss)也是一位长期研究核扩散与弃核问题的学者,他于1995年出版的著作可能是第一本将弃核当做一般性概念加以研究的著作。该书提供了有关弃核问题较为详细的案例研究,他对弃核的原因讨论得相当全面,涉及冷战终结、全球核不扩散机制、民主化和特定个人等所有因素,但其理论框架并不明确。2004年,莱斯又和其他学者一道主编了另一本关于弃核的著作,但风格上并无太大变化,也并未提出明确的理论框架。<sup>⑤</sup>

在上述两项总体性的研究之外,还存在两种研究模式,事实上分别强调了萨甘的安全模式和国内政治模式。保罗(T. V. Paul)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与萨甘的安全模式相符,其“审慎的现实主义(prudential realist)”解释框架认为,一国面临的地区安全环境是主要决定因素:面临高度不安全地区环境的国家更倾向发展核武器,反之则可能放弃这一选择。<sup>⑥</sup> 国内也有多位学者从安全模式的角度对朝鲜、伊朗等核问题进行过探讨。<sup>⑦</sup> 伊特尔·索林根(Eitel Solingen)则更强调国内政治模式,认为国内游说团体与政府采取的经济自由化决策是最主要的解释变量。她认为,采取经济自由化的国家倾向于限制其核计划、参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而那些不采取经济自由化的国家则不会限

<sup>1</sup> Sonali Singh and Christopher R. Way, “The Correlates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A Quantitative Tes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8 No. 6, 2004, pp. 865–867.

<sup>④</sup> 有学者将这个点称做一国核计划从发展到终止的“拐点(tipping point)”,参见 Kurt M. Campbell, Robert J. Einhorn, and Mitchell Reiss, eds., *The Nuclear Tipping Point: Why States Reconsider Their Nuclear Choice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4.

<sup>⑤</sup> Scott D. Sagan, “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s? Three Models in Search of a Bomb,”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1996/1997, pp. 54–86.

<sup>⑥</sup> Mitchell Reiss, *Bridled Ambition—Why Countries Constrain their Nuclear Capabilities*,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Press, 1995.

<sup>⑦</sup> T. V. Paul, *Power versus Prudence—Why Nations Forgo Nuclear Weapons*,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sup>⑧</sup> 参见沈文辉:《朝核危机的外因探析》,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邱永丰、张妍:《核扩散的逻辑——兼论朝鲜核危机爆发的必然性因素》,载《国际论坛》,2003年第4期;侯红育:《核国家向无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由来和现状》,载《国际资料信息》,2005年第6期;顾国良:《美国对伊政策——伊朗核与导弹问题》,载《美国研究》,2006年第1期。

制其核计划。从自由化中获益的国内行为体迫使政府对其核计划进行自我限制,并参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sup>1</sup>

此外,也有学者尝试使用“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作为研究一国弃核的主要解释模式。布鲁斯·简特森(Bruce W. Jentleson)和克里斯托弗·威托克(Christopher A. Whytock)对于利比亚的弃核研究就是典型。他们考察了美国对利比亚实施强制外交的三个阶段,并分别指出每个阶段的成功与失败之处。<sup>④</sup>国内学者石斌也对强制外交与美国的对朝核政策的关系进行过探讨。<sup>④</sup>

上述研究事实上涉及弃核的四个要素:安全、国内政治、规范和强制外交,究竟哪些因素起到更为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以及不同因素重要性的高低次序排列如何?本文认为,上述四个因素在促使一国弃核可能性的影响大小的排序分别为:国内政治、安全环境、规范和强制外交。尽管安全是诸多研究所强调的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动机,因此安全环境的改善是一国弃核的重要条件,但却并非充分条件,如果一国认为存在严重的安全威胁,弃核将很困难;即便安全环境有所改善,是否弃核仍需取决于国内政治需要,因此国内因素是更为根本的决定性条件。规范与强制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催化剂,其作用是否积极取决于国内政治与外部安全二者之间的不同组合。

本文将采取一种案例的比较研究方法来看弃核的可能性。本文的案例比较不是简单地对弃核案例加以比较,而是通过将弃核与继续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按一定的逻辑进行比较。本文选取的弃核案例全都集中于冷战结束后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各国的核决策都不受超级大国因素的干扰。但本文并不考察冷战后的所有弃核案例,由于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核武器事实上是继承苏联的核武器而来,无法对其发展核武器的动机予以分析,因此被排除在外。这样,本文分析的弃核国家事实上只有四个,即巴西、阿根廷、南非和利比亚。

与上述四个弃核国家相对应,本文选定了四个继续谋求发展核武器的国家。与南非进行比较的是以色列,两国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动机都是安全关切和打破国际孤立。本文将巴西和阿根廷合在一起当做一个弃核案例加以考察,与之对应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拥核案例,这两对国家的核武器发展都有一种相互关联

性,而最终南美地区走向弃核、南亚地区走向拥核,其中的原因值得考察。最后一个案例比较的是利比亚与朝鲜,两国都被美国视为“无赖国家”,经济也都相当困难,其相似性也是不少人呼吁用“利比亚模式”解决朝鲜核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sup>1/4</sup>

## 二 案例比较之一:南非与以色列

南非与以色列都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开始其核计划,但其目前的发展明显不同。1989年9月,德克勒克(Frederick Willem de Klerk)当选为南非总统,此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南非实现了完全的弃核,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扬。相比之下,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仍在继续发展。2006年6月,联合国前武器核查小组负责人汉斯·布利克斯向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提交了一份关于全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告,指出以色列目前可能拥有200件核武器。<sup>1/2</sup>

### (一)安全环境与弃核

南非与以色列发展核武器都有着共同的安全关切。无论是南非还是以色列,在发展核武器之初都有一种受到敌对邻国孤立和威胁的强烈不安全感。即使没有犹太民族离散四方、蒙受迫害和惨遭灭绝的历史,以色列在其被“敌人”——拥有数量大得多的人口、财政资源、军事力量和获得军事技术之便利的敌人——包围的弹丸之国里,也几乎全无理由感到安全。<sup>1/4</sup>因

<sup>1</sup> Etel Soling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uclear Restrai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 1994, pp. 126–169.

<sup>④</sup> Bruce W. Jentleson and Christopher A. Whytock, “Who ‘Won’ Libya? The Forced Diplomacy Debat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3, 2005/2006, pp. 47–86.

<sup>④</sup> 石斌:《从强制外交到多边协调——析美国对朝核问题的政策》,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2期。

<sup>1/4</sup> James E. Goodby, “The Libya Model Could Help Disarm North Korea,” [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04/0903northkorea\\_goodby.aspx](http://www.brookings.edu/opinions/2004/0903northkorea_goodby.aspx); Kurt A. Chin, “Libya Nuclear Deal May Be a Model for North Korea,” *Voice of America*, May 25, 2006,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news/dprk/2006/dprk-060525-voa02.htm>.

<sup>1/2</sup> 《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称以色列拥有200件核武器》,载《环球时报》,2006年6月8日。

<sup>1/4</sup> [美]迈克尔·I·汉德尔:《以色列战略的演变:不安全感与绝对安全追求》,载[美]威廉·默里、[英]麦格雷戈·诺克斯、[美]阿尔文·伯恩斯坦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565页。

此发展核武器便成为求得绝对安全的一个合理选择。<sup>1</sup>

同时,“与以色列一样,由于南非受到敌邻国的孤立和威胁,不得不与之斗争,以捍卫作为一个国家的完全生存。获得核弹是一种明确威慑他国任何将来军事入侵的方法。”<sup>④</sup>这种威胁更多来自于其想象的共产主义在南非邻国的扩张,如苏联在南部非洲的扩张势头、几万名古巴军人进入安哥拉等。

尽管南非和以色列发展核武器都包括安全动机,但安全环境的改善并非南非弃核、以色列继续发展核武器的决定性条件。到南非弃核时,诸如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等邻国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开始瓦解、古巴军队的撤走,加上纳米比亚的独立、苏联解体等事件的发生极大地缓解了南非的安全威胁,但这只是南非弃核的一个重要条件,南非发展核武器并非完全出于应对安全威胁的目的。<sup>④</sup>

对以色列而言,其目前的安全环境较其独立初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从20世纪90年代起,来自阿拉伯国家常规军事威胁的安全关切已经被恐怖主义和导弹扩散所取代。<sup>1/4</sup>此外,以色列与埃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也展开了和平进程。更为重要的是,自以色列独立以来一直得到了美国的安全保证,甚至是核保护伞的保护。可以认为,安全更多是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一个借口,安全环境的改善并未带来以色列的弃核。因此,安全并不能决定一国是否弃核,弃核决定的根本动因在于一国的国内政治需求。

## (二)国内政治决定是否弃核

国内政治因素在南非弃核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南非做出了终结种族隔离政策的战略抉择。到20世纪80年代末,南非白人已经很难继续维持种族隔离制度,黑人掌握政权只是时间问题。尽管曾坚定支持种族隔离政策,但在担任国民党主席至当选总统这一期间(1989年2月~9月),德克勒克认识到,南非的白人统治终将结束。南非正处于十字路口,局势将会演变为南非白人不可能取胜的巨大内战。因此,与其维持现状不如在尚保有相对强势地位时与黑人谈判达成一个“新交易”,这远比革命爆发时的后果要有利得多。<sup>1/2</sup>

在南非决定弃核的国内政治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南非已经启动了终结种族隔离政策的进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将下台的白人政权害怕一个由非国大党领

导的政府拥有核武器;一个黑人政府继承核武器的可能性让人不安,那将带来非常真实的“黑弹(black bomb)”的可能。<sup>3/4</sup>因此必须“避免任何核武器和核材料可能落入占人口多数的黑人之手”。<sup>⑧</sup>白人政权担心,黑人掌握核武器、核材料和核技术后不但可能向利比亚、古巴、伊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扩散,还可能将其作为与南非白人讨价还价的武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用来对付白人。<sup>④</sup>此外,德克勒克的弃核决定还有为南非白人、国民党赢得国际声望的考虑。

而以色列的国内政治条件表明,弃核不是可行的选择。尽管有人认为,以色列工党更愿意接受国际机制和军备控制,而利库德集团则是右翼、内向化的。<sup>④</sup>但近年来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发展趋势却表明,两党在核武器问题上的差异已经逐渐缩小,两党对以色列继续发展核武器、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都持默认态度。<sup>10</sup>这样,尽管在是否走自由化道路等问题上可能更多寄希望于工党,但希望工党会持弃核立场则是不现实的。

<sup>1</sup> Avner Cohen, *Israel and the Bomb*,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2.

<sup>④</sup> Roger Mookerjee and Robbie Nicholls, *Who Will Stop the Bomb? A Primer on Nuclear Proliferation*, N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 1985, p. 161. 转引自赵恒:《南非核政策的历史透析》,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4期,第51页。

<sup>④</sup> 张春:《放弃核武器的内源力分析——以南非和利比亚为例》,载《西亚非洲》,2007年第5期,第26页。

<sup>1/4</sup> Mark A. Heller,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Israeli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9.

<sup>1/2</sup> Dickson A. Mungazi, *The Last Defenders of the Apartheid*, Ian D. Smith and F. W. de Klerk, Westport: Praeger, 1998, pp. 143-150. John Edward Spence, ed., *Change in South Africa*,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4, p. 5.

<sup>3/4</sup> Mitchell Reiss, *Bridled Ambition*, pp. 20-21; Peter Liberma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uth African Bomb,”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2001, p. 85.

<sup>⑧</sup> Arjun Mahajan, Howard Hu and Katherine Yin, *Nuclear Wastelands: A Global Guide to Nuclear Weapon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 573. 转引自赵恒:《南非核政策的历史透析》,第52页。

<sup>④</sup> Frank V. Pabian, “South Afric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Lessons for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3, No. 1, 1995, pp. 1-19.

<sup>④</sup> Etel Soling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uclear Restraint,” pp. 154-155.

<sup>10</sup> 胡志东、霍刚:《以色列核战略思维模式简析》,载《理论月刊》2005年第5期,第144~146页;朱丹:《以色列核力量发展模式》,载《西亚非洲》,2003年第2期,第28~30页。

### (三)作为催化剂的规范与强制外交

国际规范和强制外交对于一国弃核与否的影响视弃核的国内政治条件具备与否而不同。在南非,由于已经具备了弃核的国内政治条件,而且安全环境也确有改善,因此规范与强制外交便促进了弃核进度。期望解除外部世界的制裁与孤立成为南非选择弃核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和改革既有民主制度的背景下,核武器似乎是南非与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取得良好关系的一个阻碍。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南非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要么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与核武器而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要么继续与西方的艰难关系。<sup>1</sup>这样,在南非试图通过放弃种族隔离政策而回归国际社会时,规范与强制外交的催化剂作用便相当明显了。

对以色列而言,尽管国际核不扩散规范的影响日渐扩大,而通过弃核可能大幅提升一国的国际声望,但由于并不具备弃核的国内条件,因此以色列的选择与南非完全相反。拥核使以色列所面临的国际孤立环境非但没有恶化,相反是大大弱化,这可能会被以色列领导人解读为,发展核武器是有效打破规范与强制外交的工具,因此弃核更是不可能的选项。而美国对于以色列拥核的纵容,更为强化了以色列坚持拥核的国内共识。

## 三 案例比较之二:巴西-阿根廷与印度-巴基斯坦

1990年,巴西-阿根廷两国总统举行会晤并签署了《共同核政策联合宣言》(Joint Declaration of Common Nuclear Policy),宣布两国只是出于和平目的使用核能,两国同时放弃发展核武器;到1991年,巴西和阿根廷都实现了弃核。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相互关系却显示出某种安全两难的特征,两国的相互敌视不断发展,核武器战略也相互促进,直到1998年,两国相继进行了大规模的核试验。尽管目前印巴两国都没有更进一步地大规模发展核武器,但两国拥核的立场仍然都相当坚定。

### (一)安全环境与弃核

对巴西和阿根廷来说,与发展核武器时期相比,弃核时的安全环境的确有了明显改善。安全并非巴西和

阿根廷发展核武器的主要动机,尽管两国相互敌视但并非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关系。对阿根廷来说,来自巴西的首要威胁是与阿根廷在人口数量与工业产品方面的力量失衡,而非地缘政治的威胁。事实上,阿根廷更有可能与智利发生军事冲突,因为这两国有着很长的边境纠纷历史。<sup>④</sup>对巴西而言,在其发展核武器的决策中,安全关切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巴西唯一重要的对手的确是阿根廷,但两国之间的上一次战争远在1828年。这样,尽管巴西和阿根廷一贯竞争各自在南美的影响力,但从未陷入地缘政治上的敌对关系,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自1979年两国就唯一的领土争端达成共识后,两国关系出现了明显好转。<sup>⑤</sup>而1980年有关核技术合作条约的签署,使得的核关系进入一种相互降级的良性循环。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弃核的其他条件都基本具备,但由于巴西和阿根廷两国国内政治条件并不成熟,因此其弃核还需要时间。

与巴西和阿根廷一样,印度和巴基斯坦也相互敌视。这两组国家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后者是高度敌对的,其最好的证明是自1947年后两国的三次印巴战争以及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持续冲突。与巴西-阿根廷相比,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计划是相互升级的,这在1998年两国的核试验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因此,很大程度上,印度-巴基斯坦的核升级是相互将对方视为自身实质性威胁的后果,尽管在1998年核试验后,印巴两国关系似乎出现了一些解冻的现象。目前,两国在建立一系列的信任对话后,同意维持1998年达成的暂停更多核试验的承诺,并建立了两国间的高层和外长热线电话。<sup>⑥</sup>2007年2月22日,印度和巴基斯坦还达成了《降低核武器意外风险协议》避免双方因突发事件而引发核战争。当然,印巴两国间深层次的相互猜疑、互为假想敌的战略不信任仍相当严重,这也是缘何在其他的地区合作都有较大发展的同时,南亚

<sup>1</sup> William J. Long and Suzette R. Grillo, "Heas Beliefs and Nuclear Policies: The Cases of South Africa and Ukraine,"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Vol. 7, No. 1, 2000, p. 32.

<sup>④</sup> Edward S. Milenky, "Argentina," in E. A. Kolodziej and R. E. Harkavy, eds., *Security Polic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2, p. 30.

<sup>⑤</sup> T. V. Paul, *Power versus Prudence*, p. 111.

<sup>⑥</sup> Gabrielle Kohneimer, "India-Pakistan Hold Nuclear Talks," [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4\\_07-08/Hotline.asp](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4_07-08/Hotline.asp)

区域合作却鲜有进展的深层原因。

有人会指出,印度发展核武器的另一个安全关切是中国。不管这是否真实,至少自1988年以来,中印关系得到了较大改善,目前两国已经就边界问题展开讨论。此外,由于印度与俄罗斯的传统关系,印度得以加入所谓的日、美、澳、印“民主价值观联盟”,因此中国因素肯定已大大下降。尽管如此,印度和巴基斯坦并没有出现弃核的迹象,安全环境的改善至多只是弃核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 (二)国内政治决定是否弃核

巴西与阿根廷的核计划都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二者的目的相似,即发展核能源,并实现技术的自给自足。<sup>1</sup>因此在两国的相互敌视缓解之后,国内因素作为弃核的决定条件的重要性便得以凸显。到20世纪80年代,巴西和阿根廷都进入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时期。在巴西,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由于核计划的“管理不善”及技术困难的出现,出现了由媒体、科学家和公众所组成的反对核计划的强大舆论力量。<sup>④</sup>与此同时,阿根廷的民主化使得其与邻国,尤其是智利与巴西的关系大为改善。在两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发展的同时,两国的经济自由化步伐也大大加快。20世纪80年代席卷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给巴西和阿根廷经济都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阿根廷甚至采取了激进的自由化措施。<sup>⑤</sup>由于接受外国资源的唯一渠道便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MF)和世界银行保持良好关系,<sup>⑥</sup>因此对巴西和阿根廷来说,弃核便是一个由国内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的双重压力下的必然选择。

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而言,弃核的国内政治条件并不具备。在印度,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是其发展核武器的重要目标之一。<sup>⑦</sup>1974年印度的核试验便是当时面临统治危机的英迪拉·甘地总理为了增强国内合法性的重要举措。正如甘地后来所承认的,当时的时机选择“对于选举来说是有用的”。<sup>⑧</sup>这一逻辑对1998年的核试验也同样适用,一贯坚持拥核立场的印度人民党(BJP)曾暗示上台后将进行核试验,而其上台后的微弱优势也急需通过核试验来加以强化其领导地位。<sup>⑨</sup>尽管目前执政的印度国大党在核武器问题上并不那么强硬,但从印度国内在与美签署民用核计划后仍坚持核试验权利的立场看,印度目前的国内政治并不支持弃核。就巴基斯坦而言,一方面

由于印度威胁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军人在巴基斯坦国内政治中的重要影响力,因此弃核也相当困难。巴基斯坦的民主化进程是否会促使其弃核,目前仍很难预料。

## (三)作为催化剂的规范与强制外交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刚刚建立,遭到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批评,认为其根本原则是歧视性的。但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已经享有很高声誉,参加核不扩散机制与否是获得更高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因此规范对于巴西和阿根廷的弃核决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sup>(t)</sup>

但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而言,规范的影响相当小。印度拥核的一个重要诱因在于赢得国际声望,并试图以此进一步换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一逻辑对于念念不忘与印度竞争的巴基斯坦来说同样适用。在规范之外,国际社会对印巴进行核试验的制裁也更多是有名无实。美国不但解除了对印度的制裁,而且还与印度签署了印美民用核协议,事实上承认了印度的核国家地位。尽管巴基斯坦拥核所换来的结果可能不如印度,但印度所得的待遇和有名无实的制裁只会进一步强化巴基斯坦的拥核决心。

<sup>1</sup> 有关巴西发展核计划的目的分析,可参见 Leonard S. Spector and Jacqueline R. Smith, *Nuclear Ambitions: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1989-1990*,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p. 242; 有关阿根廷发展核计划的目的分析,参见 Jorge A. Aja Espil, "Argentina," in Jozef Goldblat ed., *Nonproliferation: The Why and the Wherefore*,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85, p. 73.

<sup>④</sup> José Goldenberg and Harold A. Feiveson, "Denuclearization in Argentina and Brazil," *Arms Control Today*, Vol. 24, No. 2, 1994, p. 13.

<sup>⑤</sup> Etel Solinge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uclear Restraint," pp. 160-161.

<sup>⑥</sup> Isabella Alcaniz, "Slipping into Something More Comfortable: Argentine-Brazilian Nuclear Integr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ercosur," in G. M. Derhigian and S. L. Greer, eds., *Questioning Geopolitics: Political Projects in a Changing World-Syste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p. 165.

<sup>⑦</sup> Sagan, "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s?" p. 67.

<sup>⑧</sup> Rodney W. Jones, "India," in Jozef Goldblat ed., *Non-Proliferation: The Why and Wherefore*,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1985, p. 114.

<sup>⑨</sup> T. V. Paul, *Power Versus Prudence*, p. 129.

<sup>(t)</sup> Isabella Alcaniz, "Slipping into Something More Comfortable," pp. 162-163.

#### 四 案例比较之三:利比亚与朝鲜

2003年12月19日,利比亚的卡扎菲宣布了弃核决定。在不到一年后的2004年9月,美国国务院证实,利比亚已经“相当确切”地拆除了其核设施并放弃导弹计划。<sup>1</sup>与利比亚相比,尽管在1994年与美国达成了框架协议,但朝鲜却在2006年10月进行了首次核试验。

##### (一)安全环境与弃核

安全关切是利比亚发展核武器的一个重要借口,以色列所拥有的核能力是利比亚最经常引用的借口,而1981年以色列对伊拉克位于奥西拉克(Osirak)的核反应堆实施了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这进一步增强了利比亚获得核武器的决心。<sup>④</sup>除以色列外,美国也是利比亚所认定的威胁来源之一,不仅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对阿拉伯世界的打压,而且还在于美国在地中海锡尔特(Sirte)湾的军事存在。

但到2003年利比亚决定弃核时,以色列并未放弃其核能力,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不是减弱、反而是加强了。在反恐背景下,美国极可能因利比亚从事恐怖活动及其核计划而对利比亚发动攻击。<sup>⑤</sup>因此,从安全角度看,某种程度上利比亚的安全环境是恶化而非改善了。

朝鲜发展核武器有其真实的安全关切。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暗示将使用核武器以终结战争。这样,朝鲜便试图发展核武器以遏制美国,并以此作为对美国为韩国提供核保护伞的情况形成制衡。<sup>⑥</sup>冷战结束并未使朝鲜的外部安全环境得以改善,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将朝鲜命名为“邪恶轴心”,进一步强化了朝鲜的威胁感。一方面,朝鲜战争并未从技术和法律上正式结束;另一方面,无法获得美国的安全保证,对朝鲜来说,发展核武器的决策便显得似乎更为合理。

同时也应注意到的是,尽管美国不时对朝鲜“恶言相向”,但朝鲜的基本生存安全环境并未恶化。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和韩国)对美国进一步恶化美朝关系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这在1994年第一次朝鲜核危机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尽管朝鲜并未得到美国的安全保证,但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东亚国家事实上的安全保证。

##### (二)国内政治决定是否弃核

有学者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制裁以及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的胜利迫使卡扎菲“改弦更张”,<sup>⑦</sup>但事实上,利比亚放弃核计划的根源在于其国内政策的变化,尤其应考虑到,卡扎菲是利比亚发展与放弃核计划的核心人物,因此弃核对其维持权力地位显然相当重要。

利比亚发展核武器的主要目的除宣称的外部威胁之外,卡扎菲本人的民族主义热情和维持其地位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对卡扎菲而言,拥有核技术是阿拉伯世界成就的证明,是促进阿拉伯民族主义事业和提升利比亚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sup>⑧</sup>同时,拥核还可以帮助卡扎菲缓解其内部持续存在的军事政变压力,从而达到政权延续的目的。<sup>⑨</sup>

但现实给了卡扎菲沉重打击。卡扎菲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并未受到如想象中的欢迎,相反导致了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孤立。忽视经济发展、关注革命输出政策导致期望与现实之间出现较大落差,这使得国内不满情绪日益上升。<sup>⑩</sup>伊斯兰极端势力、军队、部落和意识形态等的反对势力日益强大,而且伊斯兰主义者开始与军队结盟形成反对卡扎菲的联盟,并于1993年发起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利比亚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领导权和政治体系的变革都已经不可避免”。<sup>⑪</sup>正是在强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下,卡扎菲不得不对其政

<sup>1</sup> Paula A. DeSutter, “Completion of Verification Work in Libya,” *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Nonproliferation and Human Rights*, September 22, 2004, <http://www.state.gov/t/vc/rls/rm/2004/37220.htm>.

<sup>④</sup> Lewis A. Dunn, *Controlling the Bomb: 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the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52.

<sup>⑤</sup> 胡光媛:《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动机和影响》,载《阿拉伯世界》,2004年第4期,第16页。

<sup>⑥</sup> Michael J. Mazarr, *North Korea and the Bomb—A Case Study in Nonprolifer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 17.

<sup>⑦</sup> Jentleson and Whytock, “Who ‘Won’ Libya?” pp. 47–86.

<sup>⑧</sup> Joseph C. Rincione, Jon B. Wolfshal and Miriam Rajkumar, *Deadly Arsenals: Track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1, p. 306.

<sup>⑨</sup> Lillian Craig Harris, *Libya Qadhafi's Revolution and the Modern Stat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6, p. 91.

<sup>⑩</sup> Ronald Bruce, *Libya and the United States—Two Centuries of Strif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2, p. 6.

<sup>⑪</sup> Ray Takeyh, “Qadhafi and the Challenge of Militant Islam,”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1, 1998, pp. 159–172.

策做出调整,并最终决定弃核。

朝鲜一向看重核武器,认为核武器计划可以提高其声望。<sup>1</sup> 由于朝鲜面临着严峻的经济问题,因此朝鲜极可能利用其现有的核武器换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事实上,由于六方会谈的进展、朝韩峰会的举行,朝鲜基本达到了上述目的。尽管在2006年10月的核试验后,朝鲜遭受国际孤立,但核试验更进一步强化了朝鲜的先军政治,进而也强化了政权基础。尽管有人认为,经济自由化可能会促使一国走向弃核道路,但朝鲜的经济改革相当缓慢,对其政治决策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还相当小。

### (三)作为催化剂的规范与强制外交

与南非一样,国际制裁和孤立对利比亚的弃核决定着重大的促进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利比亚因支持国际恐怖主义而面临空前的国际孤立,并被贴上“无赖国家”的标签,而与此相应的经济制裁对于利比亚的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因此,对利比亚而言,寻求西方取消对其制裁、摘掉“恐怖主义国家”或“无赖国家”的帽子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在于可大大缓解并改善其经济状况,而且还可以缓解前述的国内政治矛盾。这样,利比亚开始主动改善与相关国家关系,这对最终的弃核决定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朝鲜因其核计划和国内政治结构的原因,被美国称为“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而在其进行核试验之后,美国和联合国都对朝鲜施加了制裁。因此,从理论上讲,弃核可以改善其国际地位并解除国际制裁。但对朝鲜而言,美国自朝鲜战争结束后便开始了对朝制裁,这些制裁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并无多大的影响。因此,新近的制裁对朝鲜的影响并不太大。此外,美国最近对待印度核武器的政策极可能给予朝鲜错误的暗示,即拥有核武器不仅能得到安全,而且还能提高其国际地位,甚至还可将其当做一个讨价还价的工具获得诸多好处。因此,朝鲜可能从自身及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得出错误的推论,规范与强制外交的影响可能会强化其拥核决心。

## 五 小结

相关国家弃核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大现象,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通过对上述三对案例的比较研究,笔者基本验证了这种观点,即一国弃核是多重因素

的结果,其国内政治需求是一国弃核的决定性条件,外部安全环境的改善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却并非充分条件,而规范与强制外交更多发挥着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它们或者加快或者延缓一国弃核的步伐。

南非弃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国期望终结种族隔离制度,而安全环境的改善、规范与强制外交的压力等都并非决定因素。与之相比,尽管安全环境大为改善,但由于国内广泛存在的拥核意识,因此以色列仍在继续发展核武器。巴西-阿根廷的相互敌视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缓解,而其国内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促使两国关系改善,并导致共同弃核。与之相对,印度-巴基斯坦的相互敌视尽管有所缓解,但印度国内对拥核的一致意见、巴基斯坦的军人政治都使得弃核的国内条件并不具备,而印美民用核协议的签署更使得当前的南亚核态势得以巩固。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利比亚的安全环境相比甚至恶化了,但由于国内政治条件成熟,因此利比亚的弃核进程仍相当迅速和坚决。表面上看,朝鲜的安全环境仍相当严峻,且其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发展核武器而更为稳固,因此朝鲜未来是否彻底弃核,尚需进一步的分析和观察。

本文的研究突出了国内政治因素在一国弃核中的重要作用,这可能为解决朝鲜、伊朗核危机以及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防核扩散困境提供一些参照。在某种程度上,目前针对朝鲜和伊朗的防扩散政策都忽视了其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因此,在设计合理的防核扩散政策时,必须注意防扩散政策不只是针对占据主导的领导集团,也应针对不占主导的非领导集团、甚至反对发展核武器的利益集团。因此,防扩散政策不仅要使一国国内主导性的领导集团接受弃核的立场,同时也要强化反对发展核武器的力量,最终促使该国做出弃核的战略选择。

[收稿日期:2007-09-19]

[修回日期:2007-10-27]

[责任编辑:赵远良]

<sup>1</sup> Michael J. Mazarr *North Korea and the Bomb*, p. 19; Natalya Bazhanova "North Korea's Decision to Develop an Independent Nuclear Program," in J. C. Moltz and A. Y. Mansourov, eds.,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Program*, New York: Routledge/Bazhanova, 2000, p. 136.



politics. However, its weakness is also obvious. In particular, it cannot explain some of the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phenomena over the past 500 years. In addi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advances of military technology, the mode of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has changed accordingly. To some extent, this undermines the predictive capability of the long cycl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Diplomacy**

**Chu Shulong Wang Qing** (33)

Cultural explanations of foreign behavior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vantage point for researchers of foreign policy. China has been blessed with a time-tested rich cultural tradition, which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foreign strategy and policies. To be specific, the non-religious n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helped to sustain the non-aggressiveness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the conservative n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tressing stability and order, makes it easier for China to adopt a "integrated" strategy by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traditional holistic value system and the holistic way of thinking have bestowed a unique behavioral trait on Chinese diplomacy, and the morality-centered perception of political power has endowed Chinese diplomacy with a particular theme of self-discipline and idealism, which is the in-built spiritual motivation for China to play the role of a "responsible power".

### **New Features of Sino-U. S. Relations in the Transitional International System**

**Yang Jian'an** (42)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updat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China, together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tresses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s, cooperation and multiwin, as well as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hereas the United States emphasizes its leadership and/or dominance, mainstream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regulations.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real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pe to explore ways of expanding their common interests and of avoiding conflicts by strategic dialogue, to reallocate power and interests by construct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o tackle the conflicts of their respective values by a peaceful means. At the time of changes in the governments of the two countries, expanding cooperation and narrowing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itional international system have already becom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Sino-U. S. constructive cooperation. In addition, China should make full advance preparation so as to garner initiatives in reforming and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 **The Possibilities for a Nuclear Rollback: Theoretical Analyses and Case Studies**

**Zhang Chun** (48)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studies of a nuclear rollback are mostly based on research on the motivations for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However, satisfying the motiv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does not negate a rollback in its nuclear program.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nuclear rollback is determin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domestic politics, security,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sanctions. Although security is the major concer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an improvement in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does not necessarily induce a nuclear rollback. It is the domestic politics that eventually is decisive. As catalys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sanctions can either promote or obstruct the steps in a country's nuclear rollback. The author chooses eight countries for comparative cases studies, i.e., South Africa vs. Israel, Brazil-Argentina vs. India-Pakistan, and Libya vs. North Korea, and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es. Finally,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proper way to resolve the current dilemma of proliferation is to cre-

ate the necessary domestic conditions for a nuclear rollback by taking measures to effectively influence the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 **Nuclear Proliferation History, Modes and Prospects**

**Sun Xiangli** (56)

Based on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the author compares the different modes of proliferation and analyzes the motivations, modes and prospects for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ecurity concerns are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behind nuclear prolif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should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eliminate the dangers to regional security and construct a regional and global cooperative security mechanism. Meanwhile, strengthening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mechanism and implementing consistent standards of non-proliferation will be conducive to future trends in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 **The Global Sway of Geo-economics in the World Order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 Northeast Asia an Exception?**

**James C. Hsiung** (64)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eo-economics will eclipse (but not replace) geopolitics as a defining feature, with two distinct differing patterns of behavior by the actors. First, the balance of power will no longer be between states or their alliances. Instead, it will be played out between super trading blocs. Seco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ll no longer be a zero-sum game, making it possible to have significant cooperation going on between actors even amidst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 But Northeast Asia will be an exception to the norm. In the geo-economic context, China's rise due to its unstoppable economic growth poses a ticklish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 Some of the realist scholars who early on embraced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re now recanting and joining other mainstream scholars in reassessing that view. Another group, the "globalists," have found evidence that this is China's second rise, or re-rise, following a historical period in which China was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or greatest power)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prior to 1800. The implications are that a re-rising China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in the same light as the first-time upstarts such as post-industrial revolution Britain, Napoleonic France, post-Meiji Japan, Prussia-Germany after the Bismarckian wars, and Stalin's Soviet Union.

### **"Cultural Exception" under the Global Free Trade Framework: A Case Study**

**Wang Xiaode** (71)

In the global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cultural products can be regarded as common goods has aroused heated debates between countries led by France and Canada, and the U. S. The U. S. maintains that the cultural industry, aimed at seeking profit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rade liberalization, whereas France has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cultural exception," and has insisted on excluding cultural products from the free trade negotiations as special products. The proposition for a "cultural exception" has won wide support from countries like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anada, and has been exploited as a forceful theoretical weapon for these countries to protect their domestic cultural markets.

### **An Index to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for the Year 2007**